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

RESEARCH HISTORY OF MANCHU TUNGUSIC LANGUAGE

朝 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

RESEARCH HISTORY OF MANCHU TUNGUSIC LANGUAGE

朝 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 / 朝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61 - 3809 - 0

I. ①满… II. ①朝… III. ①通古斯满语族—语言学—研究
IV. ①H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22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韩吕徐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8
插 页 2
字 数 679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前 言

我国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以及历史上的女真语称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国内也称满—通古斯语支语言，国际上除了称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外，还称其为满洲通古斯语，以及通古斯满语或通古斯诸语等。其中，使用女真语的女真人跟历史上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生女真”、“女直”等有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满语是女真语的延续，清代就叫满洲语，后改为满语；锡伯语同样是从女真语分离出来的语言，使用锡伯语的人们在汉文历史资料上多次以“须卜”、“犀毗”、“师比”、“失比”、“席北”、“西博”、“西伯”、“史伯”、“席伯”、“锡伯”等称谓出现，后人甚至把他们解释为满族的一个早期分支；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也都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由女真语分化出来的语言。众所周知，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一个分支。由此，被我国民族语言学界叫做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

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里，历史上的女真语以及满语和锡伯语有文字，分别叫女真文、满文、锡伯文。然而，女真文始于12世纪初叶终于13世纪中叶前后，满文始于16世纪末叶，锡伯文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具体地讲，女真文是以汉文笔画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女真文还有大字和小字之分，女真大字是表意文字，于1119年颁行；女真小字属于按音拼写的文字，不过还保留了一部分表意文字的内容，女真小字于1138年颁行。女真文被创制以后，只使用了120余年就完全消失了。现在只留下了有一定研究价值的女真字文献、金石、墨迹等极其有限的历史文献资料。女真语作为历史上被女真人使用的语言，伴随女真人建

立的金朝(1115—1234)的灭亡而消失。

满文是1599年参照蒙古回鹘文字母创制的拼音文字。清代在清朝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满文作为政府用文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使用。不过,随着清朝政府的衰亡,满文逐渐缩小使用范围。现在满文基本只用于大学专门人才培养的教学,以及满文历史文献资料的阅读和研究工作。另外,满语口语,只在黑龙江省个别满族村落的满族老人中被使用。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使用满语口语人口不到10人。然而,从17世纪初满族兴盛到20世纪初满族衰亡的近300年的历史岁月中,在我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满文文献资料。

锡伯文是在1947年经民间组织“伊犁锡索研究协会”的倡导和指导下,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的锡伯族使用的满文进行改制的基础上,创制的满文式回鹘字母体系的拼音文字。锡伯文作为锡伯族法定民族文字,在新疆锡伯族聚居区的学校或机关单位里仍被使用。

也就是说,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女真文、满文、锡伯文三种文字中,女真语已经作为历史不复存在,满文只是在特定范围内使用,锡伯文的使用人口与范围也在快速缩小。毫无疑问,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文字,已经全范围地进入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他们本民族语言文字上的使用者已经整体性地减少。这跟他们参加工作时基本上使用汉文、蒙古文,适龄儿童通过汉文或蒙古文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等密切相关。特别是,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他们只能通过其他民族文字学习文化知识。而且,鄂伦春族与赫哲族主要使用汉文,鄂温克族中约有52%的人使用蒙文,48%的人使用汉文。

我国的满通古斯诸民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北京、内蒙古、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山东、河南、天津等省、市。据2000年人口统计,满通古斯诸民族共有10914427人。其中,满族有10682262人,锡伯族是188824人,鄂温克族为30505人,鄂伦春族有8196人,赫哲族为4640人。由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生活格局属于小聚居、大分散结构类型,加上横跨我国东西两个疆界,所以语言的使用根本连不成片,不同语言区间存在的空间距离太大,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们之间用彼此熟悉的母语进行交流。同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均处于被强势语言的包围之中。例如,锡伯语处于突厥语族语言的使用区内;满语和鄂伦春语及赫哲语完全处于使用

汉语的社会环境之中；鄂温克语处于使用蒙古语和汉语的语言区里。正因为如此，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深受外来语言的影响，在他们的民族语里不同程度地借用了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而且这种影响不断扩大和加深。导致就满语和赫哲语来说，只有 60—70 岁左右或在此年龄段以上的一些老人会本民族语，其他人几乎都失去了使用本母语的功能，反而均改用了汉语汉文。也就是说，满族或赫哲族中除极个别的一些老人懂本族语之外，其他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学校 and 工作中均使用汉文或汉语。鄂伦春语的使用者现在也只达到 50% 或 55% 左右，而且只有中年以上的鄂伦春人使用本民族语言，青少年或孩童中懂本民族语的人越来越少，甚至许多鄂伦春青少年或孩童已经不会说母语了，鄂伦春语自然成为了濒危语言。锡伯语和鄂温克语至今被使用得较好，并且使用本民族语人口基本上达到 80% 左右。不过，包括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在内，那些会本民族语的人，除了基本上都懂汉语之外，还不同程度地掌握蒙古语、达斡尔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罗斯语等。比较而言，鄂伦春族里懂本民族语者几乎也都掌握汉语以及达斡尔语等，鄂温克族懂本民族语者也基本会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等，锡伯族懂本民族语者多数会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等。而且，在鄂温克族和锡伯族，会本民族语的老人有些也懂俄罗斯语和日语。尽管在鄂温克族和锡伯族里有不少会本民族语的人，但由于这些民族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广播电视事业不断普及，汉族移民的急剧增多以及与汉族建立婚姻关系的现象越来越多等因素，使用鄂温克语和锡伯语的人口比例也开始逐年下降，这使鄂温克族和锡伯族也不得不开始思考，本民族语将要面临的濒危问题以及必须采取的保护母语的措​​施或方法。总而言之，我国的满通古斯诸民族，已经全范围地面临了本民族语的濒危难题或即将开始的濒危问题。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在国际上又称通古斯—满语族语言，或称为通古斯语族语言。在国内，过去也常写成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除了我国之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在俄罗斯、蒙古国、日本也有不少。其中，俄罗斯境内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被称为埃文基语（Evenki ~ Ewenki）、埃文语（Even ~ Ewen）、涅基达尔语（Negidal）、那乃语（Nanai）、乌利奇语（Ul'chi）、奥罗克语（Orok）、乌德盖语（Udege）、奥罗奇语（Orochi）等，人口约有 8 万；蒙古国境内的驯鹿鄂温克人，人口有 1000 人左右；日本北海道网走地区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还生活过被称为乌依拉特（Uilta）的通古斯人，而且在当时的统计表上显示的只有 400 多人。

再说,蒙古国的通古斯人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都是介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一种特殊语言;在日本的通古斯人一部分迁徙到萨哈林岛,一部分人融入到日本人中,自然也都不使用本民族语言了;俄罗斯的通古斯诸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都会说俄罗斯语。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俄罗斯的埃文基语、埃文语、那乃语等还根据斯拉夫字母符号系统创制了埃文基文、埃文文、那乃文等,并一直在小学的母语教育或社会人的启蒙教育,以及有关母语教科书、母语会话资料集、母语民间故事集等中被使用。很遗憾的是,现在被使用得越来越少。

有关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之概念,早在1883年俄罗斯的什连克就提出过通古斯—满语族语言的说法,他把当时被称为通古斯诸语言和满语诸语言的语言均归类为一个语族的范畴之内。进而,于20世纪30年代,通古斯—满语族语言被俄罗斯科学院的北方民族研究所解释为:(1)通古斯语支语言→应包括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索伦语;(2)满语支语言→应包括满语、赫哲语、那乃语、乌德盖语、乌利奇语、奥罗克、奥罗奇。到了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的阿夫罗林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进一步划分为:(1)北部语言群→埃文基语、涅基达尔语、索伦语、埃文语;(2)东部语言群→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3)西部语言群→满语、女真语三个部分。紧接着俄罗斯的苏尼克、瓦西列维奇等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再次分为:(1)满语支语言→满语书面语、锡伯语、女真语;(2)通古斯语支西伯利亚次语支语言→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索伦语;(3)黑龙江次语支语言→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随后,我国学者罗常培和傅懋勤将国内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分为:(1)通古斯语支语言→索伦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2)满语支语言→满语、锡伯语、赫哲语。后来,胡增益又把国内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分类为:(1)满语支语言→满语、锡伯语、赫哲语;(2)通古斯语支语言→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最后,朝克在对国内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进行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将它们分类为:(1)满语支语言→满语、锡伯语以及历史上的女真语;(2)通古斯语支语言→南部次语支语言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北部次语支语言赫哲语。

我国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内都有不同程度的方言土语差别。以现存满语口语来讲,作为已经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的语言,而且已成为只有十几个人使用的口语形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讨论方言差别意义,其口语中更多地反映出个体化了的语用形式。就从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

族村的几位满族老人的口语使用情况来看,在他们使用的满语里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性特征。这是因为,我们对现存满语口语进行调查时,发音合作人之间经常进行激烈争论,其争论的焦点不只是涉及该口语的语音问题,还包括语法关系和词汇方面的内容。后来,我们发现,其口语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跟他们的历史来源有关,来自不同地区或不同年代人的口语中竟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性特征。甚至,我们怀疑在三家子村的满族里,可能也有除了满族以外来自满通古斯语族其他民族的人。另外,黑龙江省泰来县满语口语里也有与此相关的问题,好在该地区的满语口语的使用者没几个。同时,富裕县和泰来县的满语口语间同样存在不少差异。

现代锡伯语口语的方言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课题。现代锡伯语口语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过来自满语和满语书面语、通古斯语支其他语言、蒙古语语族语言、突厥语语族语言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受到俄罗斯语等外来语言的一些干扰,所有这些一定程度地影响了锡伯语口语的使用和锡伯族之间的母语交流。我们知道,使用母语的锡伯族主要生活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该县分有八个以乡镇为单位的锡伯族生活区,其中第一、第三、第六乡属于最早在该地区定居的锡伯族生活区,第四乡属于后来由第一和第三乡分离出来的锡伯族生活区,第二和第五乡属于满族或鄂温克人较多的锡伯族生活区,第七和第八乡是后来形成的两个乡。在不同乡镇使用的锡伯语口语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像“叔叔”、“话”、“雨”、“帽子”、“教师”、“饼”、“样子”、“离开”、“是”、“喜欢”、“何时”、“比我”、“比你”之类的词或说法,在一些人的口语里发音成 $\text{ə}t\text{ʃ}\text{ə}$ 、 $\text{gid}\text{ʒ}\text{un}$ 、 aha 、 $\text{mah}\text{əl}$ 、 siv 、 $\text{əv}\text{ən}$ 、 aryun 、 $\text{ot}\text{ʃ}\text{i}$ 、 etin 、 $\text{tit}\text{ʃ}\text{i}$ 、 $\text{t}\text{ʃ}\text{ih}\text{al}\text{ə}$ 、 $\text{minid}\text{əri}$ 、 $\text{ʃ}\text{inid}\text{əri}$ 等,而在另一些人的口语里就会发音成 $\text{a m}\text{ət}\text{ʃ}\text{ə}$ 、 gisun 、 aga 、 $\text{mag}\text{əl}$ 、 sif 、 $\text{əf}\text{ən}$ 、 arbun 、 $\text{t}\text{ʃ}\text{it}\text{ʃ}\text{i}$ 、 $\text{uot}\text{ʃ}\text{i}$ 、 $\text{t}\text{ʃ}\text{ia}\text{gal}\text{ə}$ 、 aitin 、 $\text{mind}\text{ʒ}\text{i}$ 、 $\text{ʃ}\text{ind}\text{ʒ}\text{i}$ 等。从中完全可以看出,这两种说法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性特征。然而,现在的锡伯语专家学者,主要以影响力较大、使用面较广的察布查尔地区第六乡的锡伯语口语为基础,开展对于现代锡伯语口语的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工作。

赫哲语方言的使用情况跟满语口语的使用现状有相似之处。赫哲语也已进入严重濒危状态,使用人口十分少。尽管如此,赫哲语口语至今还保存着奇楞话(Kilen)和赫真话(Hedʒen)间诸多差异性特征。

鄂伦春语方言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和黑龙江

省的鄂伦春口语之间。另外，鄂伦春自治旗的鄂伦春语口语和扎兰屯市楠木鄂伦春民族乡鄂伦春语口语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鄂温克语除了辉方言（历史上称索伦语或索伦鄂温克语）、陈方言（历史上称通古斯语或通古斯鄂温克语，也叫陈巴尔虎旗莫日格勒方言或莫方言等）、敖方言（历史上称雅库特语或雅库特鄂温克语）三大方言之外，还有杜拉尔土语、讷河土语、巴音查干土语、伊敏土语等。相比之下，辉方言和陈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太大，这两个方言区的人可以用彼此熟悉的鄂温克语口语直接对话，但也时常遇到语言交流的障碍。他们之间用母语交流时遇到困难，就会使用作为第二种交流工具的蒙古语，或使用第三种交流工具的汉语等来解决语言交流的障碍。鄂温克语方言间区别特征较为显著的是，辉方言和敖方言以及陈方言和敖方言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说，使用敖方言的鄂温克人同辉方言和陈方言的鄂温克人，进行完全意义上的母语交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必须借助于第二种共同语，或第三种共同语才能达到理想的对话。不过，他们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并掌握彼此口语的区别性特征的前提下，就可以用彼此熟悉的母语口语进行交流。由于鄂温克语的其他土语均属于辉方言，所以这些土语之间只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异，他们之间的交流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另外，鄂温克语的方言土语差别，特别是方言间存在的差异关系到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在语音方面出现的区别性特征。其次，在词汇方面也较突出。因为，在辉方言和陈方言里，那些传统的狩猎用语以及温寒带森林生产生活用语基本上都不使用了，而在敖方言里这些词汇却属于该口语的主流性符号系统。另外，辉方言中使用的农业生产生活用语，在陈方言或敖方言内根本不使用。所以说，在鄂温克语的方言中，词汇方面的差异也较为明显。比较而言，语法方面出现的区别性特征要少一些。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跟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属于亲属语言。同时，与日本语和日本的阿依努语、朝鲜语以及北美的爱斯基摩语与印第安语、北欧的萨米语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共有关系。

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十分理想而显著的科研成果。但是，由于满通古斯诸民族所处的自然环

境、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差异，在不同时期内取得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方面的科研成果也有所不同。

可以说，在女真文创制之前，女真语研究工作已经开始。有了女真文以后，女真语研究事业向着更加成熟更加理论化方向发展。国外，对于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始于17世纪初，当时的朝鲜王朝司译院设立女真学厅，对女真文资料进行大量翻译，并编写女真文教科书，为学习和研究女真语或女真文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千字书》《尚书》《八岁儿》《小儿论》等女真文教科书及其他相关书籍。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也有人开始研究女真语，其中就有伟烈（A. Wylie）、戴维里亚（M. G. Devéria）、葛鲁贝（Wilhelm Grube）以及日本的白鸟库吉等女真语专家学者。他们主要以《女真译语》等早期女真语资料为基础，对女真语展开学术讨论。

众所周知，女真文伴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退出历史舞台而停止了使用，女真语虽然一直被使用，但后来却被改称满语。也就是说，现在人们所说的满语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女真语，满语是女真语在清朝政府时期的叫法，而且沿用至今。就像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满语研究从17世纪初就开始了，尤其是创制满文以后，满语满文的研究事业就蓬勃兴起，从而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满文书籍和历史资料，其中也有不少满语研究著作、满语教材、满语满文词典等，为后人的研究留下十分丰厚的资料。例如，有沈启亮的《大清全书》（1683）、清代官修的不同语种对照的系列辞书《清文鉴》（1708）、清舞格的《清文启蒙》（1730）等。在国外，从18世纪末开始就有一定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其中，就有阿米奥的《满语语法》（1798—1790）、盖博伦茨（Conon V. D. Gabelentz）的《满德词典》（1864）、扎哈洛夫的《满俄大辞典》（1875）和《满语语法》（1879）、哈列兹的《现代满语》（1884）以及穆麟多夫的《满语语法》（1892）等。

三

女真语与女真文以及满语满文的研究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而且，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对于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工作的侧重点，基本放在有关女真文文献资料、女真字碑文、女真字研究以及满文文献资料、满文档案、满文墓碑文的考证、注释、分

析整理,以及满语词汇的研究等方面。在此研究领域取得的学术成绩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刊物上相继发表的同时,也出版或油印了一些研究性著作或教科书及工具书等。在国外,以西方的李盖提(Louis Ligeti)、克恰诺夫、康丹(Daniel Kahe),日本的桑原鹭藏、石田干之助、鸟居龙藏、渡边薰太郎、园田一龟、田村实造、山本守、山路广明和韩国的李基文等为代表。在这一时期,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成果中,对女真字结构特征、女真字书写形式,以及女真文金石资料、墨迹资料等进行了学术讨论,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发现的《老满文档册》及《新老满文木碑》等十分珍贵的满文文献资料展开了相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另外,在这一时期的论著里,也有一些从应用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的视角,对满文语法结构、语音系统、词汇特征以及满文文字和索伦语等进行学术讨论的内容。其中,包括渡边薰太郎的《日语满语类集语汇》(1929),羽田亨的《满和辞典》(1937)、今西春秋的《满和对译满洲实录》(1938),以及波普的《索伦语资料》(1931)、服部四郎的《索伦语调查》(1935)和波斯特的《满语语法》(1940)等。

同时,日本的一些学者,在对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词汇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也刊印过有关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基本词汇方面的小册子。同时,在这一时期,国内外的有关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科研成果中也开始出现分析研究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语音、词汇及语法方面的有关内容。例如,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5)对赫哲语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史禄国在他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罗列了《通古斯诸语特殊词汇集》(1933)等。但这些成果不属于十分严格而系统的研究性论著,只是较简单而粗线条的分析研究。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1947年在新疆《伊犁锡索协会》的主持下,对锡伯族当时使用的满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和补充,从而创制了锡伯族现在使用的所谓的锡伯文。也就是说,锡伯文是在满文的基础上被创制的文字,锡伯文是满文延续和发展的产物。而且,在满语和锡伯语的基本词汇里,同源词达到90%以上。所以,国内外的满通古斯语言专家常说,现在的锡伯语就是满语的延续或活着的满语。

——总之,自女真文创制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工作的成绩主要体现在:(1)创制了女真文;(2)留下了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女真文研究资料;(3)创制了满文;(4)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满语满文资料;(5)发表或印刷了数量可观的有关女真语或满语研究的学术论著;(6)锡伯族在满文基础上创制锡

伯文；(7) 开始出现涉及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语音、词汇方面的论文或词汇小册子或一些研究类成果等。

四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后期，国内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事业进入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这 30 年时间里，国内外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专家学者，对满语满文以及女真文开展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对通古斯诸语言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了科学分析整理和归类。在此基础上，在此学术领域国内外出版了一系列新成果。其中，包括帕什阔夫的《满语简单句句法》(1950)、埃里希·豪尔(Erich Hauer)的《德满词典》(1952—1955)、朴昌海和刘昌惇的《韩汉清文鉴索引》(1960)、海涅什的《满语语法》(1961)、罗布森扎布的《蒙满词典》(1968)。同时，韩国的李基文、刘昌惇、崔鹤根以及日本的服部四郎、今西春秋、早田辉洋、上原久、清濑义三郎则府、池上二郎、渡边薰太郎等也发表了不少分析研究满语书面语和女真文方面的学术论文。再有，俄罗斯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专家也出版了一些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例如，有琴其乌斯的《通古斯—满语比较语音学》(1949)，苏尼克的《通古斯—满语动词》(1962)，以及《通古斯—满语比较辞典》(1975, 1977)等。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国内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论著并不多见。

还有，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至 70 年代中后期的 20 年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大学等科研院校，以及日本、韩国、美国、德国、俄罗斯、芬兰的一些大学内先后开设过多期满文专业班或满文课程，培养了相当一批满文文献资料以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专门人才。再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还先后拟定过《斯拉字母锡伯文文字方案》(1955)和《拉丁字母锡伯文文字方案》(1958)，但都没有能具体实施。新疆锡伯族始终没有放弃他们所使用的，与满文字母表基本相同的拼音文字。同时，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对于女真语语法结构、女真字构造及读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成绩。就在这一时期，在日本，山路广明的油印本《女真语解》(1956)问世，在国内，金光平等撰写完成了

《女真语言文字》(1964)之书稿。另外,我国台湾的满文专家对于满文研究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出版了有较高学术理论价值的专著及译著。其中,有台湾的李学智与人合著或独著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 I、II)》(1970)、《老满文原档论辑》(1971)、陈捷先的《满洲丛考》(1963)等。

概而言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1)油印了《女真语解》,撰写完成了女真文研究书稿;(2)撰写出版了满语同通古斯诸语动词比较研究的专著;(3)编写了满语同亲属语言或其他语言的比较词典或对照词典;(4)满语语法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绩;(5)培养了一批从事满文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专门人才;(6)收集和整理了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第一手口语资料。

五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内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成果丰硕。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对于女真文这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难度最大、历史最早且文献资料最稀少又最珍贵的冷门研究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可以说,对女真文有兴趣或从事研究的人有不少,但在此研究领域真正做出成绩的专家确实有数。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内外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关于女真文研究方面的论著和辞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女真语专家金光平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980)、道尔吉的《女真语音初探》(1982)、希格的《〈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1982)、金启琮的《女真文辞典》(1984)、贾敬颜等的《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1990)、孙伯君的《金代女真语》(2004),以及韩国的金东昭等的《女真语、满语研究》(1990)等。这些成果较系统地讨论了女真语基本结构特征,包括女真语语音系统、词汇结构、相关语法现象和形态变化原理、文字的形成和使用关系等方面的学术问题。

满语满文在这一时期得到最理想和最快速度的发展。首先,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先后成立了满学会或相关研究机构,同时在我国国内也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满通古斯语研究组、黑龙江省

满语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辽宁省档案满文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满语文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满学所满语文研究室、内蒙古大学满语研究室等研究机构。所有这些满语言文字研究机构或相关部门,在国内外先后多次开办了满文满语学习班、培训班和速成班。从而在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满语满文专业人才,其中包括接受系统理论教育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由于满语和满文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得十分及时,又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再加上在满语研究的第二阶段培养出的老一辈专家学者的指导,在这一历史阶段国内外公开发表和出版了满语研究方面的许多论著。尤其是,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所创办了《满语研究》(1985)这一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之后,有关满语满文的学术讨论更加显示出活力和生机。满语满文研究论文首先在数量上迅速增多,质量上也逐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满语满文学术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和辞书30余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乌拉熙春的《满语语法》(1983)和《满语语音研究》(1992)、季永海等的《满语语法》(1986)、刘景宪等的《满语研究通论》(1997)等。有关满语口语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赵杰的《现代满语口语研究》(1989)和《现代满语与汉语》(1992)、季永海等的《现代满语八百句》(1989)、恩和巴图的《满语口语研究》(1995)、金启琮的《波斯湾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中的《三家子满语口语分析》(1981)、赵阿平等的《黑龙江现代满语研究》(2001)、王庆丰的《满语研究》(2005)等。有关满语教材方面有乌拉熙春的《满语读本》(1985)、爱新觉罗·瀛生的《满语读本》(1986)、屈六生等的《满文教材》(1991)、金宝森等的《满文讲义》等。满语文献资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庄吉发的《满汉异域录校注》(1983)、陈捷先的《满文清实录研究》(1978)和《清文清本纪研究》(1981)以及《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1986)、季永海等的《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1988)和《随军纪行译注》(1987)、赵志忠的《〈满迷〉研究》(1993)等。满语书面语及文献资料词汇方面的词书类有奇车山等的《旧清语辞典》(1987)、任世铎的《无圈点字书》(1987)、商鸿逵等的《清史满语辞典》(1990)、安双成的《满汉大辞典》(1993)、胡增益等的《新满汉大词典》(1994)、刘厚生与李乐营主编的《汉满词典》(2005)等。这些学术成果,充分展示出国内满语界的研究力量和雄厚理论优势,也使满语研究事业更加成熟、更加理论

化和科学化。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满语研究学者服部四郎、今西春秋、早田辉洋及上原久、清濑义三郎则府、池上二郎、菅野裕臣、坂井卫、渡边薰太郎、中岛干起、津曲敏郎等也刊发了不少满语满文研究论著。另外,韩国的成百仁、崔鹤根、金东昭、金周源、高东昊等也发表了有关满语满文研究成果。还出版了马丁·稽穆(Martin Gimm)的《德满词汇对照集》(1978)、罗杰瑞(Jurry Norman)的《简明满英辞典》(1978)和《满英辞典》(1979)以及《满语语法》(2003)、威廉姆·罗兹克(William Rozycki)的《满语逆序词汇》(1981)、朴恩用等的《〈御制清文鉴〉索引》(1982)、福田昆之的《满语书面语词典》(1987)、河内良弘等的《满语语法》(1996)和《满语书面语词典》(1996)、池上二郎的《满语研究》(论文集,1999)、中岛干起的《清代中国语满语词典》(1999)、阿布罗林(Aburorin)《满语语法》(2000)、戈列罗娃(Gorelove. Liliya. M)的《满语语法》(2002)、早田辉洋和寺村正男的《大清全书正文篇》与《大清全书索引篇》(2002)、《大清全书增补修订正文篇》(2004)、《大清全书增补修订本满文索引篇》(2004)、《大清全书增补修订汉文索引篇》(2004)等研究著作和辞书。

总之,在这一时期,国内外满语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满语书面语语法现象的深层次分析研究。而且,在此学术领域,做出最突出贡献的是我国满语界的专家学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或发表了全面系统研究满语书面语语法现象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以及富有学术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一系列论著。同时,对于现存满语口语的语法研究领域,我国专家学者也开展了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调查研究,具体实施和完成了不少重大科研项目,发表和出版了不少十分珍贵具有学术理论价值的论著。再者,像欧美、日本、韩国的满语学界学术同仁,也在满语语法研究领域做出较大贡献。所有这些,为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错综复杂的满语语法现象,打下了十分雄厚的资料基础,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语法研究理论方法。

六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锡伯语研究也是走过了让人赞叹的一段历程。首先,新疆成立了《锡伯语言学会》(1981),创办了